

## 学科综述

## 2016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综述

田旭 刘玮\*

【内容提要】本综述包括如下 5 方面内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进展，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国际贸易和投资，国际货币与金融，能源与气候变化和国际发展。亮点之一是，国际关系新理论扩展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为反思理性主义提供了元理论上的支持。受到反全球化思潮的影响，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其中包括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色、定位和对策，是年度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组织与规则 国际贸易与投资 国际货币与金融 国际发展

2016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许多理论和实证方面的进展。以国内外最主要的 17 份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刊物为对象，本文梳理了 2016 年 91 篇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文章，其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国际制度与组织议题的文献最多，分别占到总文献的 28% 和 25%（见表 1）。

表 1 2016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分布 单位：篇

	IPE 理论	国际制度	国际贸易 和投资	国际货币 与金融	能源、气候变化 和国际发展
《世界经济与政治》	12	3	3	2	1
《当代亚太》	2	1	2		
《中国社会科学》		1		1	
《国际经济评论》		5	2	1	
《外交评论》			1		
《国际金融研究》				2	

\* 田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民主理论，tianxu@cass.org.cn。刘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sjz-liuwei@cass.org.cn。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并自负文责。

续表

	IPE 理论	国际制度	国际贸易 和投资	国际货币 与金融	能源、气候变化 和国际发展
《世界经济》			1		
《国际政治科学》	3	2			
《国际政治研究》	1			1	
《中国工业经济》			1		
AJPS		1			
IO		4		3	5
RIPE	5	2	2		8
ISR	1		1		
IS	1				
RIO		4	2		3
EJPE				1	
其他	2				
合计	27	23	15	11	17

注：表中，AJPS 是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的缩写，IO 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的缩写，RIPE 是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的缩写，ISR 是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的缩写，IS 是 International Security 的缩写，RIO 是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的缩写，EJPE 是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缩写。因部分文献属于跨议题研究，因此各主题的文献数据统计加总后与文献总量数据存在一定出入。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 一、国际秩序变革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

###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视角

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初步显现出“中国特质”。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近代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诸位学者尝试通过“关系”和“社群”这些相关联的概念来对国际关系元理论进行新的解读。

秦亚青（2016）提出一种“国际关系的关系理论”。该理论的形上内涵在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性，而非西方主流理论中的个体性。它将国际关系视作由一系列发展中的关系所构成的，将国际行为者视为时刻处于关系之中，并在本体论上将过程定义为一种流



动的关系。这一理论框架也许可以促使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国际关系,并对进行国际体系进行广泛的比较。<sup>①</sup>类似的,苏长和(2016)指出会通法在认识世界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互联互通的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资源。他主张在会通法基础上延伸和扩大关系的范围,从关系选择角度认识国家行为和国际秩序演变。关系理论视角为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提供了理论解释选项,而中国与世界的互联互通实践也为关系理论提供了实证研究素材。与此同时,关系选择往往比理性选择更能解释群体的合作行为和秩序的演进,因此可以重新解释通过自我调解解决零和对抗。最后,他还指出了关系理论的术语表达和在沟通上可能面临的问题及解决途径。<sup>②</sup>

与关系理论的发展相对应,张宇燕(2016)用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进行了高度概括。<sup>③</sup>

高奇琦(2016)基于儒家与社群主义之间的概念相似性,提出了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群世界主义治理模式。在他看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这一组必然相关的辩证关系被世界自由主义割裂开来,忽视了国家在现实政治中的根本性地位,因而导致了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冲突化等问题。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逻辑链条,高奇琦提出了以惠报作为行为逻辑,以动态向心体系为内部结构,以友爱为结果的社群世界主义。该社群世界主义强调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在目标上的一致性,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即不仅要在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向全球治理目标推进,而且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最终实现需要建立在各国的国家治理状况均等化的基础上。<sup>④</sup>

从这个理论范式的转变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国内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且还尝试从自身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出发去发展出一套新的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行为的规范性理论。特别是秦亚青的“国际关系的关系理论”已经初步完成了理论构建,较为清晰地解释了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政治舞台和国内政治治理上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互动中“中国行为模式”,同时还对中国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哲学基础。

## (二) 全球公共物品和区域公共物品

### 1. 全球公共物品供给与中美大国关系构建

霸权稳定论中的国际公共物品概念依然是解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特别是中美战略关系的有效视角。在美国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意愿下降,中国提供全球公共物品意愿上升的现状下,中美之间如何通过合作来维持并改革现有的国际体系成为学界需要探讨的问题。

冯维江(2016)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对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开始较大规

<sup>①</sup> Qin, Y. (2016).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8 (1): 33-47. 本文所引文为秦亚青教授于2016年所发表于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的英文文章,其文中的部分观点已于2016年之前发表于中文刊物,如秦亚青(2015):“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探索——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期,第4-10页。

<sup>②</sup> 苏长和(2016):“关系理论的学术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0期,第29-38、156-157页。

<sup>③</sup> 张宇燕(2016):“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4-9页。

<sup>④</sup> 高奇琦(2016):“社群世界主义: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互动的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25-39、157-158页。

模地减少,且中国的投入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这一稳定的双向结构趋于失衡。因此,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表现为二者既可能演化为大国对峙的平行式平衡体系,也可能演化为双中心的合作型的新型大国关系。前者中,两国可能倾向于向各自的战略联盟提供公共产品,并接受盟国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而后者中,两国互相进行充足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且接受其他国家的关系专用性投资。为了防范第一种情况的发生,作者认为中国可以对世界,特别是美国权力相对稀薄的地区,开展自己的公共产品投入,如“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合作机制和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等的公共产品投入,甚至可以增加与美国主要盟友之间的相互关系专用性投资,但中国不宜显著地进一步降低对美国的已有关系专用性投资存量,使自身滑向修昔底德陷阱。<sup>①</sup>

李向阳(2016)通过比较两者的联系纽带、合作机制、目标及定位,作者认为二者目前都以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亚洲地区为基础,但是前者为规则导向,以高门槛和排他性为特征,目的在于保证美国在该地区,乃至全球制定国际经济规则的话语权,同时抑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而后者则以发展为导向,以开放性多元化为特征,属于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二者目前并不互相包含,且暗含着竞争关系。相较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而言,“一带一路”意在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与促进多边主义的发展,因此“一带一路”具有更高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作者预测,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走向、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sup>②</sup>

邢悦(2016)通过分析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崛起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指出崛起国获得国际支持的重要原因在于提供能维持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公共产品,而非与国际社会拥有共享价值。因此,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未必是中国崛起过程中获取国际支持的必然障碍。<sup>③</sup>

一些研究则从更加具体的政策领域和国际组织的角度,分析了中美如何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过程中调试中美关系。李杨和黄艳希(2016)以中美国际贸易制度之争为例,分析了中国自加入WTO以来,中美对于国际贸易规则态度的变化。作者认为,中美两国将是未来国际贸易领域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和竞争者。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不断提高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并通过与美国尽可能的合作,创新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这一论断同样验证了冯维江对于中美提供公共物品意愿和能力的判断。<sup>④</sup>相似地,李杨和苏骁(2016)通过分析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及G20框架中的收益-成本认为,G20的价值与美国的利益诉求相兼容,它是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因此,中国对此需要积极有效地应对,包括如下措施。(1)加强中美对话,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加强与欧盟合作,利用G20机制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3)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利用其力量实现自身利益诉求。(4)提

① 冯维江(2016):“中美权力博弈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进——基于公共产品与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106-128、159-160页。

② 李向阳(2016):“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一带一路’之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29-43、155-156页。

③ 邢悦(2016):“崛起国如何获得国际支持——以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案例的研究”,《国际政治科学》,第3期,第1-28页。

④ 李杨、黄艳希(2016):“中美国际贸易制度之争——基于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0期,第114-136、159-160页。



升自身综合实力,推进G20机制化进程等。<sup>①</sup>孙忆(2016)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并验证了美国对中国所施加的国际规则压力和国际伙伴压力,指出了中国应对美国自贸协定战略双重压力的策略在于深化国内改革,提升规则能力,搭建自己的自贸协议伙伴网络,以及与美国等制度主导国探讨共建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可能性。<sup>②</sup>

相较中美霸权此消彼长的观点,Silove(2016)指出美国转向亚太的战略实质虽是其想要维护亚洲区域现有的平衡,但该目标的实现并不必然导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遏制。在作者看来,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为不可避免,是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常量。因此,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在于通过提升美国和其盟友的力量来赶上中国的增长速度,进而达到一种新的权力平衡。同样,对于TPP不包含中国的原因,作者认为美国试图通过TPP来倒逼中国的开放和改革,进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sup>③</sup>肖河(2016)根据英、苏、日三者谋求与美国对等地位的过程中均因战略选择失当而导致了失败,而只有德国采取了接受现实的追随政策,才使得美德关系保持了长期高度的稳定的历史经验,总结出世界霸权只能和平转移,而无法被挑战的既有结果。这暗含着对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实现中美之间的和平权力转移的必要性。<sup>④</sup>相较于肖河的分析,薛力(2016)认为尽管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但中国希望与美合作的基调并未改变。亚太再平衡战略与“一带一路”之间虽有竞争乃至对抗的一面,但并非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中美两国可以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文化、国际制度等多维度进行合作,其中经济、军事与安全合作可以作为主要维度。因此,薛力认为中美应该在不同方面互相调适,以便在和平的状态下,建立双边关系的新均衡。以上论述为中国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所应扮演角色,以及如何处理中美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sup>⑤</sup>

## 2. 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与东亚地区秩序转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在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全球和区域层面的矛盾及问题也逐渐显现。受到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理论的启发,陈小鼎(2016)和王亚军(2016)提出中国在制定周边外交战略和构建亚洲安全观上,应有意愿和能力加强在区域公共物品方面的投入。通过提供区域公共物品,如理念、项目和制度等,以培育区域内行为体的互信和提升区域内跨国合作。

陈小鼎(2016)指出中国周边关系面临着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动、制度的重叠与矛盾性,以及周边国家认同低下等三大困境。基于欧盟成功实践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经验,作者认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对于破解周边外交难题具有很大潜力,此概念既可避免大国的“私物化”与小国的“搭便车”等问题,又能够推动区域合作和政治互信,塑造稳定的区域秩序,从而有助于化解周边外交难题。同时,作者还指出应注重区域公共产品在改善相关国家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完善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提升区域合作水平,制度认同与集体

① 李杨、苏骁(2016):“G20: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兼论中国的应对策略”,《当代亚太》,第2期,第58-79、157页。

② 孙忆(2016):“国际制度压力与中国自贸区战略”,《国际政治科学》,第3期,第125-161页。

③ Silove, N. (2016). The Pivot before the Pivot: U. S. Strategy to Preserve the Power Balance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0 (4): 45-88.

④ 肖河(2016):“霸权国与其他主要大国关系研究——以二战后历史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第3期,第44-73、157页。

⑤ 薛力(2016):“美国再平衡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第56-73、157-158页。

认同,才可能逐渐塑造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sup>①</sup>王亚军(2016)解读了亚洲安全观的科学内涵和重要价值。在他看来,区域公共产品因其意图解决区域切实问题,受益人承担成本等原则,使得其能够更有效地避免搭便车现象以及区域大国对该制度的私物化。而中国所倡导的“亚洲安全观”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是中国为地区安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设想。通过提出共同安全目标、强调综合安全内涵、构建合作安全模式和倡导可持续安全理念等维度,亚洲安全观为亚洲安全机制等其他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指引。<sup>②</sup>

通过对国际公共产品和区域公共产品的论述,以上作者均抓住了中国崛起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大国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就在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美国企图通过在东亚提供区域公共物品来抑制中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而中国同样希望通过参与区域公共物品提供来构建亚洲安全观和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双方会不可避免地就制度供给进行交锋。刘丰(2016)综合经济和安全两个视角进行分析,指出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经历了从完全霸权到部分霸权的发展,目前呈现出向完全均势过渡的态势。但是由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动以及地区内各国的战略调整等因素,体系转型进程及其最终形态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在东亚的战略选择就成为了绕不开的议题。<sup>③</sup>

### (三)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新发展

以跨国行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型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成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讨论重点之一。《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6年第五期以“新型复合相互依赖路径”为主题组织了一期专题讨论。

Farrell & Newman (2016)指出,当前更为深入的相互依赖塑造着人们的偏好与实现偏好的能力。传统的以贸易开放为主要目标,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研究路径具有局限性。因此,他们提出了新型复合相互依赖路径(NIA, New Interdependence Approach)的概念来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作者指出,以奈和基欧汉为代表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受到开放经济政治学,结构现实主义和理性制度主义的挑战而逐渐式微。然而,现有理论模型在解释经济相互依赖对于全球政治的影响时,同样未能很好地抓住跨国政治的实质以及新型治理模式的成果。因此,通过强调规则交叠、机会结构和权力不对称这三个视角,作者指出了跨国行为体而非国家行为体,在新型复合相互依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际秩序是如何经由多种路径被创立或重塑的。<sup>④</sup>

首先,规则的交叠既可能带来冲突,也同样是促进合作的机遇。Newman & Posner

① 陈小鼎(2016):“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世界经济与政治》,第8期,第37-55、157-158页。

② 王亚军(2016):“亚洲安全观的科学内涵与重要价值——基于系统论和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管理世界》,第12期,第1-5页。

③ 刘丰(2016):“东亚地区秩序转型:安全与经济关联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第32-55、156-157页。

④ Farrell, H. & Newman, A. (2016). The new interdependence approach: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5): 713-36.

(2016)以国际金融协会(II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为例,探讨了规则交叠如何促进和建立新的国际标准。国际金融协会在从一个没有管控议程和游说技巧的边缘机构到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工程跨国论坛的这一转型过程中,软性法的第二序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新型复合相互依赖路径的第一个特征表现为多元参与主体带来了多样化的治理制度,而这些制度之间往往存在竞争,因而可能促使更加包容的新制度的形成。<sup>①</sup>

其次,新型复合相互依赖将国际制度,特别是非正式的国际制度,视为能够促进不同行为体进行跨国协调的机会结构。Johnson(2016)探索了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合适时机。他以粮农组织的发展为例,以资源和价值间关系为切入点,解释了粮农组织官僚机构与非政府组织间合作、共赢、竞争和冲突的几种循环往复关系。通过这一案例分析,约翰森进一步指出新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在于:非国家行为体作用凸显;全球化进程并非处于无政府状态中,而是处于交叠的责任和原则的大环境中;制度并不仅仅是游戏规则,更是国际和国内权力流转的驱动力。而(2016)则是以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BCBS,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为例探讨了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参与和形塑国际制度。<sup>②</sup>

最后,规则交叠和机会结构的结合会导致政治权力的不对称。在构建于贸易基础之上的全球格局中,行为体并不具备平等的权力。因此,一旦发生规则交叠和冲突,那么相关行为者就在解决方案的制定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希腊债务危机的处理为例, Moschella(2016)指出在对希腊债务危机的调查过程中,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央行所特有的权限为他们提供了非对称性的权力,进而使得他们通过制定不同层次的新规则来维护货币联盟的财政纪律。这一案例也印证了在逐步加深的相互依赖情景中,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国和跨行业行为体的参与合作。<sup>③</sup>

在讨论的最后, Kahler(2016)提出了复合型治理的概念。在他看来,复合治理打破了国家行为体对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主体的垄断,强调了跨国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非政府机构等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然而,作者也指出了新型复合相互依赖路径在功能和空间两方面的局限性。其功能局限在对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不够敏感,而其空间局限在于仅适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逐步推广,而非迅速扩张。<sup>④</sup>

相较于国外学界对相互依赖理论的重构与扩展,国内学界对于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仍关注于其经典观点,如自由主义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和平,而现实主义认为其增加冲突。

庞铭辉、敖杏林(2016)收集了1981-2007年中国与周边17个国家截面组成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控制“相对综合实力”和“制度性参与程度”等其他变量后,经济相互依赖的确显著提升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符合自由主义的理论预期。<sup>⑤</sup>然而,韩真、张

① Newman, A. & Posner, E. (2016). Structuring transnational interests: the second-order effects of soft law in the politics of global fi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5): 768-98.

② Johnson, T. (2016). Cooperation, co-optation, competition, conflict: international bureaucraci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5): 737-67.

③ Moschella, M. (2016). Negotiating Greece. Layering, insulation, and the design of adjustment programs in the Eurozon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5): 799-824.

④ Kahler, M. (2016). Complex governance and the new interdependence approach (N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5): 825-39.

⑤ 庞铭辉、敖杏林(2016):“经济相互依赖:和平之路抑或冲突之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实证研究(1981~2007)”,《当代亚太》,第3期,第126-152、156-157页。

春满(2016)通过使用新的模型和数据对加茨基模型进行了改进,并使用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当两国间资本流动量越大,发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也越高。这一结论符合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sup>①</sup>王日华(2016)指出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在于“内生-经济优先”型的崛起模式。其中,以国家自身发展,而不是以联盟和对外扩张为基础的内生型崛起模式,有助于避免二者的直接对抗。而经济发展则加深了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从而缓解了后者对前者崛起的恐惧。<sup>②</sup>魏南枝(2016)则以中美关系为对象,指出了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之间的动态关系。在魏南枝看来,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逐渐失去了效用。随着中国向全球生产链中高端发展和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美之间的经济博弈加强。“亚太再平衡”战略表明中美间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与矛盾相互交织。因此,务实合作应取代商业和评论,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可以说,以上的中文文献对于相互依赖概念的研究依然以国家为主要对象,而缺乏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sup>③</sup>

## 二、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

2016年度关于国际制度和组织的研究文献涵盖了全球治理的新视角、国际制度参与和制定以及国际组织这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其中,对于全球治理的讨论包含了从中国视角来构建全球治理框架和解决全球治理实践问题。在国际制度参与和制定方面,文献主要回顾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因素,同时还探讨了国际制度对国内制度的可能影响。对于国际组织的讨论涉及了国际组织中的权力流转,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国内政治,以及政体因素与国际组织发展的关系。

### (一) 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是国际制度的研究重点之一,2016年关于全球治理概念的多篇文献不约而同地重点讨论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显现了较强的主体意识。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和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也不断深化与凸显。张宇燕(2016)指出了当前全球治理所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人类全球治理的需求加大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三是全球治理的改革已经启动但却步履蹒跚。基于这些问题,张宇燕以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话语来精准地表达了中国版本的全球治理理念。如坚持发展中的大国身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等开放和包容理念,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原则以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特别是以共建“一带一路”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等。<sup>④</sup>与张宇燕的观点相呼应。蔡昉(2016)提出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政治经济问题上应该采取的策略应包括坚定而耐心地推进全

① 韩真、张春满(2016):“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第2期,第130-155、160页。

② 王日华(2016):“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国际政治科学》,第2期,第37-73页。

③ 魏南枝(2016):“中美政治、安全矛盾与经济相互依存”,《现代国际关系》,第11期,第48-54、62、64页。

④ 张宇燕(2016):“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4-9页。



球化,利用不断提升的经济地位来提高自身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经济内外联动,以及通过共享发展使得全中国人民受益。<sup>①</sup>

姚枝仲(2016)指出中国要以新的开放理念来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一新的理念既要兼顾国内经济发展转型,又要兼顾打造一个更为公平、合理、平衡的全球治理框架和秩序。针对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规则进行改革的困难性,姚枝仲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对策。一是发展一套平行体系。二是积极参与规则谈判,尤其是多边机制谈判,如WTO、G20等。三是发展与自身地位相称的主导规则制定的能力,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建设性的、甚至是领导作用。<sup>②</sup>徐秀军(2016)从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可能模式做出了理论总结。他指出中国重塑未来世界经济秩序的路径包括修正性的制度改革、建设性的制度补充及创造性的制度替代。这三种路径对应着中国参与的嵌入式秩序、中国推动的竞争性秩序及中国主导的包容性秩序等三个模式。<sup>③</sup>

## (二)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经济治理

作为一个代表性高且规范性强的全球治理平台,二十国集团(G20)在美国经济危机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6年所发表的关于G20的文献多从经济、合作与改革等视角对G20的治理方式和成效进行了分析与展望。马涛等(2016)在对二十国集团智库贸易投资会进行总结时指出,在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且区域贸易协定发展方兴未艾的情况下,G20应努力促进全球投资政策合作与协调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以及多边机制和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sup>④</sup>韩冰(2016)对G20在国际投资领域目前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展前景作出了分析。在他看来,当前国际投资治理领域中并没有类似于国际贸易治理领域中的WTO等机构,因此G20机制有望在这一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2016年中国为G20中国峰会投资议题内容与提出动因的分析,作者指出当时的国际投资形势面临着复苏压力、体系碎片化、冲突解决不力和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因此,G20在其国际影响力和多边机构资源的基础上,还需通过开放成员身份,从非正式机制到正式机制,以及建立争端解决机制等转变,才可能成为有效的国际投资治理机构。<sup>⑤</sup>杨盼盼(2016)回顾了主要G20经济体在中国作为主席国期间通过的经济改革政策。在她看来,尽管G20各经济体已经逐步认识到在基础设施投资、财政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等领域的结构性改革在提升潜在增长率的重要性,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注的侧重点存在差异,因此未来该议题需注重南北异同。与此同时,国家行为体的改革方案与国际组织的建议存在分歧,因此G20可在国际合作层面为结

① 蔡昉(2016):“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及中国策略”,《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4-24、157页。

② 姚枝仲(2016):“以新的开放理念,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第31-34、4页。

③ 徐秀军(2016):“从中国视角看未来世界经济秩序”,《国际政治科学》,第期,第90-117页。

④ 马涛、苏庆义、韩冰、白洁(2016):“以全球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包容性增长——二十国集团智库贸易投资会议纪要”,《国际经济评论》,第5期,第149-159、8页。

⑤ 韩冰(2016):“二十国集团在国际投资领域的合作与前景展望”,《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第53-66、5页。

构性改革提供支持, 并加强互动和交流。<sup>①</sup> 鲁桐 (2016) 分析了 G20 参与《OECD 公司治理原则》的修订过程、结果和意义。她指出《G20/OECD 公司治理原则》是在更广泛国家参与和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达成的结果。修订后的原则扩充和完善了原有框架, 将为各国的公司治理改革提供新的坐标和重要参考。<sup>②</sup>

### (三) 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

国际制度对国内公共政策的影响一直是国际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 常常被称为规范内化或政策扩散。Beazer & Woo (2016) 指出国际货币经济组织通常通过各层级的制约条款来影响国家的国内公共政策, 这些条款将 IMF 的财政支持和政府政策改革的承诺相挂钩。那么, 这些制约条款在何时促进, 又在何时阻碍国内经济改革呢? 作者指出, 更为严格的 IMF 限制条款的效果取决于国内政党政治因素, 而非普世意义上改革所带来的效益和损耗。对于左翼政府而言, 更多的 IMF 限制能够迫使其不顾及右翼竞争对手的抵制, 而进行更为大胆的改革。但对于右翼政府而言, 在限定条款增加的情况下, 其往往借口来自左翼的改革阻力, 阻碍改革的推行。通过使用 IMF 后共产主义国家在 1994 - 2010 年间的的数据, 作者们证实了这一理论假设。<sup>③</sup> 然而, Kentikelenis et al. (2016) 对 IMF 在 2008 年后的改革提出质疑。通过对 1985 - 2014 年间 IMF 对 131 个国家的贷款协议政策条款的分析, 作者指出 IMF 的改革重新启用了许多强制性的改革条款, 而有实质进展的却很少。因此, IMF 改革不仅是纸上谈兵, 更是一种虚幻。<sup>④</sup> 而 Biglaiser et al. (2016) 研究发现, IMF 的确降低了第三世界国家征用外资 (没收国际资产) 的可能性。因为 IMF 对于借款者具有直接影响力, 而且没收行为是对国际产权的公然违反。利用 1961 - 2006 年间的征用数据和对资金体量度量的不同方法, 作者发现在 IMF 协议中的国家在国有化外国公司方面的可能性较低。作者同样发现, 基金影响力最大的情况发生在一是当 IMF 提供的贷款超过了借方的国内生产总值时。二是政治机构较弱的国家。研究表明 IMF 仍然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sup>⑤</sup>

Jo & Simmons (2016) 首次系统地对国际刑事法庭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威慑效应进行评估。跨国数据支持了国际刑事法庭有条件发挥影响的假说。虽然国际刑事法庭无法阻止所有行为者, 但还是可以阻止一些政府和那些寻求合法性的叛乱团体的暴行。<sup>⑥</sup> Eimer et al. (2016) 通过对巴西和印度践行知识产权的案例分析, 指出国际压力和国内偏好对于国际规范的本土化过程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作者看来, 国际规范的本土化取决于国际政治压力和国

① 杨盼盼 (2016): “G20 结构性改革的进展与评述”, 《国际经济评论》, 第 5 期, 第 48 - 67、5 页。

② 鲁桐 (2016): “《G20/OECD 公司治理原则》(2015) 修订内容及其影响”, 《国际经济评论》, 第 6 期, 第 134 - 145、8 页。

③ Beazer, Q. H. & Woo, B. (2016). IMF Conditionality, Government Partisanship &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Refor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0 (2): 304 - 21.

④ Kentikelenis, A. E., Stubbs, T. H. & King, L. P. (2016). IMF conditional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space, 1985 - 2014.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4): 543 - 82.

⑤ Biglaiser, G., Lee, H. & Staats, J. L. (2016). The effects of the IMF on expropriation of foreign firm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1): 1 - 23.

⑥ Jo, H. & Simmons, B. (2017). Can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Deter Atroc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1 (2), 419 - 421.

内公私偏好的一致性。<sup>①</sup>

也有研究试图从国内政策和国际规则的双向互动的角度解释国际制度的发展。陈琪(2016)等人指出在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经济治理不仅包括国际规则的国内化,也包括国内规则的多边化。因此,新兴大国在经济治理过程中应如何规避国际政策对自身经济治理规则的挤压,如何协调国际和国内规则就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在他们看来,首先,新兴大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过程中,需要通过吸收国际规则并优化国内规则。其次,新兴大国需要增强自身规则制定能力,提升国内规则的理论化和普适化水平,推动国内规则影响国际规则。最后,新兴大国应积极争取国际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并积极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以改变单向被动地吸收国际规则的状况,这样更有利于协调国际与国内经济治理的关系。<sup>②</sup> 相似地,郑宇(2016)从国内和国际制度的视角探索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作者指出,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收敛。其原因在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降低了新兴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增加了新兴产业升级换代的难度,以及新兴国家脆弱的经济结构等都造成新兴国家难以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不仅需要内部制度和治理改革,也需要对现行国际经贸规则进行改革,以争取足够的产业政策空间。作者指出,中国在国际规制改革中应该贯彻“包容性多边主义”的原则。不仅应当推进国际发展合作,更应该在国际规则制定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提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议案,以获得更广的国际支持。在国内政治因素中,政体类型是影响国际制度设计和国际组织行为的重要变量。例如,对于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由于他们极难进入由发达民主国家所领导的回报丰厚的现存国际组织,因此它们通常通过组建新的国际机构来解决自身存在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如民主巩固和发展等。然而,这些新国际制度宪章中应该包含何种规章和制度成为了民主化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sup>③</sup>

Kaoutzanis et al. (2016)以准入规则为切入点,考察了民主化国家对组织扩张过程中的规则设计的影响。通过对324个国际组织的准入投票规则的分析,作者指出正在进行民主化的国家倾向于设计严格的准入规则来对组织的扩张进行联合管理。这有助于他们排除非民主国家在进入国际组织后可能对现有制度构架和民主转型过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此外,相关研究指出国际组织内的民主程序虽能够解释国际组织对跨国行为体的开放性,但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内在逻辑却没有深入分析。<sup>④</sup>

Tallberg et al. (2016)研究了成员国政体类型对国际组织开放性的影响。作者基于对1950-2010年间50个国际组织内的跨国行为体进行了多变量分析,并辅以对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案例分析,指出民主对于国际组织开放性的影响,主要是国际组织中民主国家的

① Eimer, T. R., Lütz, S. & Schüren, V. (2016). Varieties of localization: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knowledge in India and Brazi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3): 450-79.

② 陈琪、管传靖、金峰(2016):“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当代亚太》,第5期,第4-32、153页。

③ 郑宇(2016):“中等收入国家的国际制度‘陷阱’”,《世界经济与政治》,第7期,第131-155、160页。

④ Kaoutzanis, C., Poast, P. & Urpelainen, J. (2016). Not letting ‘bad apples’ spoil the bunch: Democratization and str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ccession rule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4): 399-418.

集体影响力以及他们确保自身偏好获得组织支持的能力这二者的产物。他们通过对三种不同类型的民主（民主大国、民主巩固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对国际组织开放性的影响进行理论化和评估，进一步指出新型民主国家和民主大国的联合对组织开放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在最后指出了采用多数决法则的决策方式有助于提升民主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开放性，进而削弱了组织中的专制国家阻碍改革的能力。这些发现对于理解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和民主制度对世界政治的功效具有启示。<sup>①</sup>

Linos & Pegram (2016) 探讨了不同政体国家在国际协议谈判中使用的灵活的、具有妥协性的语言对国家后续行为的影响。文章通过对 107 个国家采取 22 项国家人权机构的机构保障措施原始数据集分析和案例研究，考察了 1991 年“巴黎原则”对国家人权机构设计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即使整个协议是无约束力的，协议语言的变化仍可能对国家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都更好地遵守了使用严格语言的条款，而威权国家对使用灵活语言的条款的遵守程度要更低。<sup>②</sup>

#### （四）权力转移与国际制度变革

权力结构一直是影响国际制度发挥作用和发展演变的重要因素。Milewicz & Snidal (2016) 提出国家在多边事务中的权力和独立性会影响其参与多边条约的态度。文章发现，实力强大并独立于美国的多边大国，能够影响条约内容，因此倾向于支持多边法律合作。当美国不领导多边条约时，他们参与多边条约的态度更积极。而弱国或依赖美国的国家影响条约的能力有限，因此不太支持多边协议，但在批准协议时会受到美国的压力。文章对涵盖多个议题的战后主要多边条约批准决定的分析，支持了作者的观点。<sup>③</sup>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权力转移如何影响国际制度变革成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和部分发达国家经济逆增长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如何处理和适应其成员国之间的权利流转成为不可避免的难题。黄薇 (2016) 以 IMF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对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进行了分析。以 2008 年改革方案落实之前和 2010 年改革方案实施之后的两套投票权分配方案为对象，采用了绝对 Banzhaf 指数和 Coleman 指数来测算 IMF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前后成员国的决策权大小及其变化。实证结果证实了投票权改革的确有助于 IMF 成员国决策权差距的缩小，但是投票权比重变化与决策权变动之间并没有严格线性关系。因此，着力推动 IMF 采用 70% 多数票获胜规则将有助于新兴经济体的权力提升，特别是中国的综合决策权力、阻止行动的权力以及倡议行动的权力。<sup>④</sup>

Zangl et al. (2016) 提出了制度主义的权力流转理论 (Institutionalist Power Shift Theory) 来对国际组织如何适应其成员间的权力流转提供一套全面的理论解释。该理论通过整合功能

① Tallberg, J., Sommerer, T. & Squatrito, T. (2016). Democratic membership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design.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1): 59 - 87.

② Linos, K. & Pegram, T. (2016). The Language of Compromise in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3), 587 - 621.

③ Milewicz, K. & Snidal, D. (2016). Cooperation by Treaty: The Role of Multilateral Pow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4), 823 - 844.

④ 黄薇 (2016): “国际组织中的权力计算——以 IMF 份额与投票权改革为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12 期，第 181 - 198、208 页。

主义视角下制度转型条件和机制的观点以及理性制度主义历史性和分配性的变量,提出国际组织制度性调试的成败取决于新兴国家是否能够渐进地、合理地消解和挑战现存的国际制度,并推进一套更为合理的权力分配方案的改革。作者们通过分析印度和巴西是如何被纳入长期由发达国家把持的WTO核心协商团队,以及中国是如何与现行大国就实现更为公平的IMF成员国财政稳定监管计划达成一致这两个案例,成功地验证了其理论相较于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更为合理的逻辑和解释力。<sup>①</sup>

除了受到权力转移的影响外,制度环境也会影响国际制度变迁。Abbott et al. (2016)通过分析当代气候治理,提出通过组织生态学的理论来解释全球治理机构中组织形式的变化。认为全球治理中新的组织形式(包括非正式机构,政府间网络和私营跨国监管组织)迅速扩大,而正式的政府间组织的生长放缓,是由于制度环境,特别是组织密度和资源可用性对组织行为和生存力的影响。文章分析认为,政府间组织(IGO)的持续增长,受制于其拥挤而密集的制度环境,从而陷入停滞。而跨国监管组织(PTRO)受益于组织灵活性和低准入成本,而能够在有限的资源竞争中进入“生境(niches)”。这一研究与新型复合相互依赖的理论相呼应。<sup>②</sup>

### 三、国际贸易和投资

#### (一) 地缘政治与区域贸易协定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一。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引发了全球贸易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流转,进而导致了关于国际贸易制度的竞争。如前文所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大贸易体,中国和美国在此过程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双方都致力于通过领导自贸区谈判来争取贸易伙伴并制定贸易规则。李巍(2016)从制度现实主义出发讨论了中美在自贸区竞争中的制度竞争关系。在李巍看来,由于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深度困境,美国主导的TPP、TTIP和TiSA谈判无疑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制度压力,而中国则通过RCEP、中日韩、中国—海合会等积极有为的国际贸易制度回应。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两国在权力地位、公共产品供给和自贸区合法性三个方面均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如果能够保持制度相容性,将有利于形成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包容的国际贸易新体系。反之如果这种竞争导向制度互斥性,则有可能侵蚀既有的多边主义贸易框架,加剧国际贸易体系的碎片化。<sup>③</sup>

宋泓(2016)从加入一个贸易自由化协定的过程、条件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因素出发,指出了在假定情况下,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需要至少十多年的时间。与此同时,作者还从地缘政治的视角讨论了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于中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sup>①</sup> Zangl, B., Heußner, F., Kruck, A. & Lanzendörfer, X. (2016). Imperfect adaptation: how the WTO and the IMF adjust to shifting power distributions among their member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2): 171-96.

<sup>②</sup> Abbott, K., Green, J. & Keohane, R. (2016). Organizational Ecolog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2), 247-277.

<sup>③</sup> 李巍(2016):“现实制度主义与中美自贸区竞争”,《当代亚太》,第3期,第4-34、153-154页。

指出中国要努力构建以己为中心的区域政治经济网络,形成对以美国为首的 TPP 的一种平衡。<sup>①</sup>

通过对 TPP 文本规则的分析,东艳和苏庆义(2016)探讨了 TPP 规则对于中国产业发展、市场运行及管理体制所可能产生影响的综合因素分析,指出中国应在自由贸易区战略布局、中国版国际经贸新规则设计、深化改革及中国产业发展及营商环境构建等方面挖掘应对之策。<sup>②</sup>

区域贸易制度不仅关系到大国间战略关系,同样还影响着区域内部安全。郎平(2016)探索了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区域贸易制度和安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区域贸易制度与区域内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指出只有在地区冲突基线风险为中等和高水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越高对冲突升级的抑制作用才越大。而在冲突基线风险为很高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难以发挥和平效应。因此,和平效应并非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而是受到经济收益预期、高层互动机制、冲突的性质和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复合影响。<sup>③</sup>

## (二) 制度距离与国际贸易

国家间法律的融合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国际贸易,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当前大量研究集中于探索国家通过国际公法(public law)来促进国际贸易的努力,即通过形塑旨在降低政府障碍的“偏好贸易协定(PTAs)”来促进贸易。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另一个机制,即国内法律的国际融合。Efrat(2016)指出国家往往尝试通过整合各国贸易法来促进贸易。法律融合的潜在假设在于国家间商法的多样性阻碍贸易,相比之下,国家间商法的相似性则通过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来刺激贸易。作者认为,国内法的融合进程成为了通过公法刺激贸易的替代品,具有有限数量的偏好贸易协定(PTAs)的国家通过参与司法融合进程,来弥补这一缺陷。通过分析《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这一主要的法律融合工具,本文论点得以证实。本文呼吁贸易和国际法学者将国内法纳入其研究进程。<sup>④</sup>

与国内法的融合作用不同,文化的异质性反而能够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施炳展(2016)以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热播为视角,论证了文化认同对于对外贸易发展的积极影响。作者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该剧热播提升了中韩贸易增长速度,且这一促进作用对于差异化产品尤为显著。<sup>⑤</sup>该研究的意义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挖掘了促进贸易增长的突破口,促使学者去思考如何运用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来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推进中国文化传播而助力于中国企业和产品国际化。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并不乐观的情况下,推进文化产业走出去也许会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动力。

① 宋泓(2016):“中国加入 TPP:需要多长时间?”,《国际经济评论》,第2期,第57-70、5页。

② 东艳、苏庆义(2016):“揭开 TPP 的面纱:基于文本的分析”,《国际经济评论》,第1期,第37-57、5页。

③ 郎平(2016):“区域贸易制度的和平效应分析——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当代亚太》,第3期,第101-125、156页。

④ Efrat, A. (2016). Promoting trade through private law: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legal harmonization.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3): 311-36.

⑤ 施炳展(2016):“文化认同与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第5期,第78-97页。

此外,政体差异也是增加国际贸易中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如民主国家往往拒绝与独裁政体进行贸易。虽然按照国际管理法,独裁者在出售其臣民资源的时候应该正常地被视作合法的,但是民主政体仍然可能选择拒绝与该国进行贸易。在切实改变目标(独裁)国家政治生态的时候,断绝贸易会被认为是成功的。通过研究自然资源交易,Nili(2016)指出,由于独裁者没有权利去销售属于民众的自然资源,因此民主国家拒绝从独裁者处购买自然资源就成为了应有的规范。同时,这一行为通过阻止本国公司参与犯罪实现了其道德目标。<sup>①</sup>

### (三) 国际贸易的政治效应

相较于法律、文化和政体因素对于国际贸易行为的影响,国际贸易同样也型塑着政体类型的变迁和一国的国际关系战略。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主流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解释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然而,伴随着政治民主转型,威权统治同样得到了巩固。对此现象,主流文献无法做出很好解释。田野和曹倩(2016)在马克思、摩尔和罗戈夫斯基的理论基础上,构建出一套基于阶级均势的分析框架,说明了国际贸易与政体转型间的关系。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比较研究,作者指出国际贸易在劳动要素充裕时,随着贸易的开放,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将会运用他们增加了的收入和财富来更有效地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积聚了更多的政治与组织资源,这往往会促进民主转型。而当土地要素充裕时,国际贸易增加了精英的财富和收入,进而强化了他们对政权的控制能力,这样就使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权力均势变得对精英更为有利,因而国际贸易往往会促进威权巩固。

国际贸易发展不仅决定政体类型变迁,同样还对一国对外关系和战略选择具有深远的影响。任洪生(2016)对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近三十年中朝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OECD国家的经济周期、世界经济周期和OECD国家的进口增长率与中朝关系活跃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数据回归结果表明,在OECD国家经济扩张时期,中朝关系相对冷淡。而在OECD国家经济收缩期,中朝关系则相对活跃。通过提出“政治中周期”概念,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中国对外投资对未来中朝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分析结果表明国际化程度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sup>②</sup>

### (四) 国内政治与跨国投资

东道国政治制度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陈兆源(2016)指出政体类型和否决者这两个重要的政治制度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的关键考量。政体类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准入阶段,而否决者数量所产生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投资实施阶段。根据2000-2012年171家中国企业在196个可能的投资目的地所记录的670次投资事件整理而成的数据库,作者通过定量研究方法证实了其理论假设。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民主制度意味着更强的政治竞争性和行政约束,因此民主制度与中国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sup>①</sup> Nili, S. (2016). Rethinking Economic "Sanc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8 (4): 635 - 54.

<sup>②</sup> 任洪生(2016):“国家战略、经济周期与中朝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外交评论》,第6期,第22-44页。

反之,威权政体不显著影响中国赴该国投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否决者数量的增加可以提升政策稳定性,因此有助于吸引中国企业。而否决者更替比例大小与中国的投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sup>①</sup>

同时,母国的国内行为体利益偏好也会影响东道国的外资政策。吴其胜(2016)指出,在同样面临来自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压力下,不同利益考量的东道国生产商会有不同外资政策偏好。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半导体、可再生能源和钢铁产业生产商对外来投资立场的案例进行分析,作者指出东道国生产商根据它们在外资来源国商业利益规模,来决定是否主张对外来投资进行限制或采取歧视性政策,即东道国生产商政策偏好的开放性与它在外资来源国的商业利益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作者同时指出,东道国生产商的外资政策偏好不完全受到国内政策约束,它们会通过游说等政治手段来推进政策改革,进而实现自身的商业目的。该研究同时也对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策略上提出了具体建议。<sup>②</sup>

## (五) 国际政治与跨国投资

国际政治环境,特别是双边政治关系同样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杨连星、刘晓光和张杰(2016)通过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特征,验证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基于2005-2014年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分析,作者们指出友好双边政治关系在整体上有助于促进对外投资规模、多元化程度和投资成功率。然而不同双边政治关系工具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短期性的高层互访和非正式的友好城市交流,对于企业投资规模和多元化程度的促进效应更强,尤其是友好城市交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投资成功率。友好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促进资源获取型,如能源行业的投资,但无法促进对基础设施行业,如交通运输业的投资。而双边政治冲突则对企业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因此,作者们建议中国在规划“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需要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的行业禀赋特征,在兼顾投资增速与成效的基础上,发挥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投资成效的保障作用。同时,作者还强调了参与多边治理机制对于双边关系的补充和提升作用。<sup>③</sup>

也有学者集中考察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s)的决定因素及其对跨国投资的影响。Betz & Kerner(2016)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利用外资和保持自身政策自主性之间进行权衡。在作者看来,双边投资协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权衡的可能。双边投资协议通过国外直接投资(FDI)的形式来增加本国使用国际资本的权限,但是代价在于本国的政府政策自主性在实质上受到限制。作者通过对3000个双边投资协议的经验分析指出,许多国家倾向于接受这种权衡。然而,分析结果同样指出政府签订和批准双边投资协议的热情受到国别和时间的影响,因而存在差异。作者认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资本稀缺性在双边贸易协议的签订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一旦一国对于外资的需求上升,那么该国就越会考虑接受这种权衡,进而促进了BITs的签订。更具体地说,高美元利率和净外部财政债务

① 陈兆源(2016):“东道国政治制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2000-2012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129-156、160页。

② 吴其胜(2016):“国际商业利益与东道国生产商的外资政策偏好”,《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第131-155、160页。

③ 杨连星、刘晓光、张杰(2016):“双边政治关系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二元边际和投资成败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11期,第56-72页。



(net external financial liabilities) 之间的一致性提升了政府利用外资的动机, 因此导致了双边投资协议的签署。<sup>①</sup>

奇尔顿 (Chilton 2016) 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式对美国签订投资贸易协定的动机进行了探索。通过定性分析美国行政官僚的观点, 定量分析对外投资协议的签订与军事援助和是否为前共产主义国家等变量间的关联, 奇尔顿认为双边投资协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对外政策考量, 而非其他。<sup>②</sup>

中国资本输出的国际效应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Kaplan (2016) 认为中国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很重要的以长久远见为特征的资本, 中国快速的全球扩张已转变了传统的经济相互依赖和国家政策自主性之间的关系。在此情况下, 一国政府在制定发展战略时能免于受到短期资本撤回的威胁。通过对巴西和委内瑞拉两国在引入中国资本前后的比较案例分析, 卡普兰指出随着中国资本的注入, 偏爱国外政府投资的委内瑞拉能够长期保持预算赤字的稳步增长, 而巴西受制于自由资本偏好, 更偏向于使用市场资金。结论指出, 中国国有资本在拉美国家外部筹资中的占比越高, 该国的财政赤字就越大。<sup>③</sup>

## 四、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近年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而其中尤以人民币汇率改革, 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为研究重点。

### (一) 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

在2015年8月11日汇改启动后, 人民币一度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理清人民币汇率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成为研究热点。余永定、张斌和张明 (2016) 指出, 央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面临着兼顾市场力量和汇率维稳的一个两难。在他们看来, 人民币不存在大幅贬值的基础, 且汇率维稳弊端重重。因此, 央行应该放弃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让市场供求来决定人民币汇率。然而, 为了防止非市场因素导致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 可以引入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宽幅波动的折中方案来代替汇率自由浮动方案。这个方案避免了汇率贬值幅度过大对经济的冲击, 也兼顾了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浮动汇率的好处。作者同时强调了加强资本管制对汇率改革的必要性。<sup>④</sup>

在2016年5月8日初步形成了以“收盘价+篮子货币”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后, 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逐渐回稳, 外汇储备开始止跌。余永定和肖立晟 (2016) 指出“收盘价+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机制提高了汇率确定的透明度, 在一定情况下有助于稳定汇率预

① Betz, T. & Kerner, A. (2016).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 Real US interest rates and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4): 419-48.

② Chilton, A. S. (2016). The political motiv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progra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4): 614-42.

③ Kaplan, S. B. (2016). Banking unconditionall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finance in Latin Ame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4): 643-76.

④ 余永定、张斌、张明 (2016): “尽快引入人民币兑篮子汇率宽幅区间波动”, 《国际经济评论》, 第1期, 第9-19、4页。

期,但人民币汇率缺乏灵活性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因此,结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历史,分析资本流动、汇率压力、汇率预期和外汇储备四者间的关系及其发展,作者提出了中国汇率体制改革仍然应该尽快实现可自由浮动。在此过程中,可以通过引入人民币盯住宽幅一篮子货币作为过渡措施来防止资本市场可能出现的恐慌,避免过度干预外汇市场,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外汇储备的损耗。于此同时,作者建议货币当局可以不对外公布允许的波动幅度,通过信息不对称来分化市场上的多空双方,以市场的力量来稳定汇率。<sup>①</sup>这个结论与余永定、张斌和张明(2016)等人的观点相一致。

## (二)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

与汇率政策高度相关的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甚至可以说,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央行通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来实现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对外开放。

在资本账户开放研究中,以新兴市场国家是否应该保留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为当前学界的热点问题。张明(2016)通过梳理关于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文献及近年来国内关于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讨论,分析了中国政府开放资本账户的行为逻辑。张明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主流学界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应该保留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中国央行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行为逻辑,固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却在较大程度上忽视了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潜在风险,高估了中国政府管理持续大规模资本外流的能力。因此,张明认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及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为了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的逆转,中国政府最好遵循渐进审慎的资本账户开放模式,通过鼓励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逐渐使用价格工具、深化结构性改革和建立金融预警机制等举措来更稳健、可持续地开放中国的资本账户。<sup>②</sup>

国际货币的形成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市场现象,同时还有赖于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李巍(2016)总结了英镑、美元、欧元和日元成为国际货币的经验,指出强大的货币伙伴网络和有力的国际制度体系是塑造稳定的国际货币地位的两个主要政治因素。因此,中国政府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不仅应通过放松管制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力量,同时还应通过积极的国际货币外交来争取更多的货币合作伙伴,构建更为有利的国际制度体系。在搭建国际货币的伙伴网络和创立国际货币的制度体系过程中,需要高度仰仗自身国际政治领导能力的发挥,它包括基于信誉塑造的公信力、利益供给的向心力和制裁实施的强制力三个维度。由于当下人民币还处于货币崛起的初步阶段,因此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国际政治基础建设,更加需要通过信誉塑造发挥榜样的公信力和利益供给发挥向心力。<sup>③</sup>

<sup>①</sup> 余永定、肖立晟(2016):“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推进方向”,《国际金融研究》,第11期,第3-13页。

<sup>②</sup> 张明(2016):“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行为逻辑与情景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第139-155、160页。

<sup>③</sup> 李巍(2016):“伙伴、制度与国际货币——人民币崛起的国际政治基础”,《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79-100、205-206页。

### （三）政体因素与对外金融政策选择

民主和威权政体对国家金融政策选择，如外汇储备和主权违约选择等产生多样的影响。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威权政体在外汇储备体量上超越民主国家成为常态。Jäger (2016) 指出国家外汇储备的不同政策选择可以通过两个重要的制度主义理论来解释。第一，政治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外汇储备往往在选举前减少。第二，否决者理论认为大量的否决者增加了央行人员事实上的独立性，而央行往往不愿意投资外储。作者对 182 个国家在 1990 - 2013 年间的的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指出民主政府倾向在选举前减少他们的外汇储备，而否决者并不直接影响外汇储备量。大规模的否决者倾向于将政治经济周期限制在选举之前（即使得选举对政治经济周期不敏感）。选举和否决者对威权政体不构成影响。选举周期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国家在大量积累外储周期上落后维权国家。<sup>①</sup>

Ballard - Rosa (2016) 则试图回答什么因素导致独裁者对其主权债务违约。该文章发展出一个独裁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理论，具体考察了非民主政体下，政治行为体的生存激励对主权债务违约的影响。自我利益导向的精英出于对城市动荡威胁其任期的担忧，可能愿意忍受违约造成的长期借款成本，而不愿承担取消城市消费者廉价食品政策的短期生存成本带来风险。文章通过对 45 个国家超过 50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城市化和食品进口与独裁国家违约可能性增加相关的假说。实证结果显示，更依赖进口食品 and 城市化更高的独裁者，更可能会对其外部主权债务造成拖欠。文章以赞比亚和秘鲁主权债务违约的历史例证，证明了作者在理论中提出的机制。对粮食价格增长可能引起城市动荡的恐惧，确实迫使专制精英走向国际债务义务违约。<sup>②</sup>

### （四）全球与区域金融治理改革

张发林 (2016) 指出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是一个介于正式国际机制和完全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的半正式体系。该体系存在半正式性、“小规模多边主义” (minilateralism) 和多元多层次性等特征。这一体系存在一系列困境，如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基于“二十国集团”的半正式关系依然无法将碎片化的金融治理体系黏合起来，建立在“小规模多边主义”基础上的网状结构和体制复合体缺乏国际合法性，以及体系有效性不足等缺陷，因此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任重道远。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路径依赖的观点，张发林提出了对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最佳时期就是危机后时期，因此改革时机具有紧迫性。<sup>③</sup>

与张发林的分析相吻合，中国现阶段的确寻求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上有所作为。随着 2008 年金融危机、2009 年中国开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 2010 年欧洲债务危机，中美作为当前国际金融舞台上的两个核心行为者，二者的国际金融地位发生了相对的变化。美国作为金融

① Jäger, K. (2016). The Role of Regime Typ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Reserve Accumul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4: 79 - 96.

② Ballard-Rosa, C. (2016). Hungry for Change: Urban Bias and Autocratic Sovereign Defaul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2), 313 - 346.

③ 张发林 (2016):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国际政治研究》，第 4 期，第 63 - 85、4 - 5 页。

霸权国的地位有所削弱，而中国作为金融崛起国，其国际金融地位日益上升。这一权力流转推动着国际和区域金融治理框架和制度的改革。

李巍（2016）指出了中美两国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关系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基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逐步扩张的金融机构和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期待改变自己在既有的全球金融治理制度框架中的不利地位，意图推进国际金融制度改革和积极推进区域层面的建制。而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其主要采取了防御性的国际制度外交，以拖延中国的改革和抵制中国的建制行动为主要策略。但是李巍强调，中国并不意在颠覆现有的金融治理制度结构。在改革方面，中国呼吁新兴国家的集体行动，并争取与传统霸权国合作。在建制方面，中国始终强调新机构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强调新旧机构在国际规则上的统一。这表现出了中国作为金融崛起国在面对霸权国时的成熟与审慎。然而，即便中国的改革和建制愿望是美好的，但竞争究竟是呈现相容性还是互斥性将对国际金融治理格局产生深远影响。<sup>①</sup>

相似地，陈四清（2016）从“去全球化”背景下亚洲金融合作的意义出发，回顾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发展历程、阶段特点和现实障碍，对深化亚洲金融合作提出政策建议。作者指出，由于对美元流动性的高度依赖、区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和合作向心力不强等因素仍制约着亚洲金融合作步伐，因此风险防范仍将是亚洲金融合作的首要内容。从长期看，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有效实现需要发挥中国等主要国家的引领作用，塑造亚洲金融合作新规则。在市场结构上，既要大力发展股票、债券和银行信贷等诸多传统领域，也要广泛引入新的融资方式与技术手段，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服务效率。在合作机制上，则应发挥中国香港的独特优势，形成其与新加坡、上海、东京、迪拜等金融市场的合力，共同推动亚洲经济发展。<sup>②</sup>

英国在1931年暂停金本位仍然是上世纪最大的国际金融政策冲击，是国际金融体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传统观点关注国际条件的变化和社会民主的兴起对放弃金本位制度的影响。国际合作的倒退和英国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得维持金本位制愈发困难。同时，新兴的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利用不断发展的“社会目标”来抵抗保卫金本位制而采取的紧缩政策。当英国拒绝承担不断增长的维护汇率的成本的时候，英格兰银行被迫放弃了金本位制。Morrison（2016）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决策者在关键时点的因果观念上。他通过大量档案研究，发现英格兰银行应对英镑外逃采取了分裂的政策。央行行长诺曼主张通过渐进的升息来捍卫英镑的命运，但没有取得效果。诺曼的继任者哈维将英格兰银行的策略从防御性加息转向追求财政紧缩。然后，他“暂时”地暂停了黄金兑换，以防止金本位支持者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落选。当这种非故意安排下的管制性的浮动汇率被证明是成功的以后，凯恩斯便能够说服政策制定者接受了新的汇率制度。<sup>③</sup>

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是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领域。当前国际金融监管网络是否能够有效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Wilf（2016）通过考察巴塞尔协议III对美国银行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发现美国银行业的股票收益率确实受到更严格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损害。这

① 李巍（2016）：“中美金融外交中的国际制度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第112-138、159-160页。

② 陈四清（2016）：“去全球化背景下亚洲金融合作的新思路”，《国际金融研究》，第8期，第3-12页。

③ Morrison, J. (2016). Shocking Intellectual Austerity: The Role of Ideas in the Demise of the Gold Standard in Brita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1), 175-207.

一结论说明以巴塞尔协议 III 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是可信的,且对美国受监管企业没有偏袒。<sup>①</sup>

## 五、国际发展、能源和气候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 (一) 资源诅咒与政体转型

能源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其要点在于关注国际能源经济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体系和国内政治发展。Paine (2016) 通过建立正式模型,整合了石油生产导致暴力冲突和石油收入帮助威权政体威胁持久统治两类相互矛盾的石油影响内战的机制。该研究发现,大规模的石油生产收入增强了政府能力,并产生了降低政权争夺型内战倾向的总体效应。但相对于其他收入来源,石油收入在防止政权争夺型内战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sup>②</sup> Brooks & Kurtz (2016) 重新审视石油财富和政体之间的关系,挑战了传统认为自然资源财富导致专制的观点。在作者看来,多数探讨自然资源禀赋与政体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忽视了民主和石油收入本身可能都是工业化进程的内生变量,因此将研究问题复杂化。文章通过对 1970 - 2006 年全球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资源内生性和区域内制度扩散的几种机制是民主化的重要决定因素。通过对拉丁美洲工业化历史的定性研究,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证实。石油财富不一定是诅咒,甚至可能是对民主发展的祝福。<sup>③</sup>

相较于能源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可能具有的重大影响,发达国家稳定的制度框架使其能够更为从容地面对来自能源的挑战。吕江 (2016) 指出美国页岩革命成功的基石在于美国的制度基础而非技术。美国油气领域的制度和规则以市场为导向,制度在不断试错演化的过程中推进了技术的革新与突破,因而促成了此次页岩革命。同时,作者还指出这一制度仍在进一步的演化过程中,从回归市场转为与环境相容。<sup>④</sup>

### (二) 气候治理与生物安全

相比能源问题,有关气候的问题是近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新兴议题之一。谢来辉 (2016) 通过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权力概念,提出碳排放应被视为一种新的权力来源。通过对全球气候治理历史的比较分析,作者指出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权力结构与主要排放大国之间存在明显的联系。“排放权力”和全球结构性权力共同成为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力量。

<sup>①</sup> Wilf, M. (2016). Credibility and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Regulations: Evidence from US Bank Stock Retur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4), 763 - 796.

<sup>②</sup> Paine, J. (2016). Rethinking the Conflict “Resource Curse”: How Oil Wealth Prevents Center-Seeking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4), 727 - 761.

<sup>③</sup> Brooks, S. & Kurtz, M. (2016). Oil and Democracy: Endogen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olitical “Resource Cur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2), 279 - 311.

<sup>④</sup> 吕江 (2016): “规则的背后:对美国页岩革命的制度反思”,《美国研究》,第 2 期,第 95 - 108、7 页。

这一研究为理解新兴排放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时的历史性责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sup>①</sup>

与气候相关的另一个研究维度在于生物安全。Carroll (2016) 通过使用波兰尼的“国家-社会”双向互动和葛兰西的关系权力理论,对当前转基因农作物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根源及其当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当前社会对转基因生物的质疑,作者指出目前的反转基因运动不太可能撼动转基因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根源。<sup>②</sup>

### (三) 国内政治与国际发展援助

国际发展援助是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比较迅速的研究议题。一方面,部分文献从受援国的视角分析了遵守援助条款的动机和对待援助的态度等问题。针对受援国, Girod & Tobin (2016) 探索了为什么受援国会遵守援助条款,有别于以往主流的战略重要性视角。在作者看来,解释履约行为必须理解受援国对主要收入来源(如外国直接投资和自然资源租金)的收益最大化需求是如何改变受援国的履约动机。通过使用世界银行1964-2010年履约记录的数据,在排除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结果坚定支持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sup>③</sup>此外,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更愿意接受选举观察,而不愿意接受技术性选举援助? von Borzyskowski (2016) 指出往往政府因面临着高成本(如集权统治)而不愿意接受技术性选举援助,而国际机构往往也因为政府不愿意或无法完整执行援助计划而不愿意提供援助。通过统计分析1990-2003年间130个国家的数据,作者的假设得到证实。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更倾向于接受选举观察,而非技术性选举援助。<sup>④</sup> Milner et al. (2016) 通过选取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乌干达公民群体进行试验,通过随机打乱援助项目名称的方式,对乌干达公民对待外国援助的态度进行了量化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本国政府计划,研究对象明显更为支持国外援助计划。特别是当公民认为当前政府较为腐败、裙带关系盛行、或对执政党不满的时候,公民们往往认为国外援助项目更有效率,且倾向于接受援助者所提出的条件。这一实验结果与援助者控制理论相符。<sup>⑤</sup>

另一方面,部分文献探索了援助国偏好和行为方式对援助计划的影响。Bermeo (2016) 认为援助国的偏好是受援国民主化的主要驱动力。以往的主流文献认为,外国援助和其他非税资源一样,无法促进专制政权的政治变革。贝尔米奥指出了外国援助具有与其他可替代资

① 谢来辉(2016):“碳排放:一种新的权力来源——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排放权力”,《世界经济与政治》,第9期,第64-89、157-158页。

② Carroll, M. (2016). The new agrarian double movement: hegemony and resistance in the GMO food econom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1): 1-28.

③ Desha M. Girod, Jennifer L. Tobin, “Take the Money and Run: The Determinants of Compliance with Aid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6, Vol. 70, No. 1, pp. 209-239.

④ von Borzyskowski, I. (2016). Resisting democracy assistance: Who seeks and receives technical election assistance?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2): 247-82.

⑤ Milner, H. V., Nielson, D. L. & Findley, M. G. (2016). Citizen preferences and public goods: comparing preferences for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 programs in Uganda.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2): 219-45.

源不同的性质。<sup>①</sup>以1973-2010年间数据为基础,作者建立了一个包涵援助国偏好变化和外国援助异质性的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援助与民主变革可能性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仅限于冷战时期。此外,为了应对受援国的腐败和国家机构效率低下的问题,一些援助国将对外援助外包给非国家发展行为体,而另一些捐助国政府继续采取国家对援助的管理,努力加强受援国的国家能力建设。这些援助方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各国对国家在公共服务提供中所扮演适宜角色的不同导向。Dietrich (2016) 指出了援助国的政治经济条件和援助方式之间的相关性。对市场效率高度重视的国家(例如美国、英国、瑞典),为了让援助有效地惠及到服务对象,会在管理不善的受援国进行援助物资外包。相比之下,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中居强势地位的国家(例如法国、德国、日本)则会继续支持由国家来提供援助。基于时间序列的跨部门援助数据和个人层面的跨国高级别援助官员样本的问卷数据,均验证了本文的假设。要理解不同的援助政策,需要了解援助国的政治经济条件。<sup>②</sup>

此外,国际发展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国际规范的本土化。对于国际规范而言,其规范适用性往往强调本土行为体在规范本土化过程中的主体性。然而,国际组织在南方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南方的本土行为者是否以及如何实践规范适用性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本土化理论和社会制度主义往往认为本土行为者对发展规范态度往往口是心非,只说不做。Anderl (2016) 在研究孟加拉民族志的基础上指出,尽管发展组织往往顾虑本地发展规范且不顾及联合国法案,他们的实际行为仍然与新千年发展目标和人类发展指数等全球性概念保持一致。行为者的言行不一致使其行为无法判断。<sup>③</sup>

## 六、新议题:全球化、国内政治与国家税收政策选择

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2期以“发展中国家税收收益汲取的挑战和机遇”为主题,集中探索了全球化和国内政治对税收政策选择的影响。Swank (2016) 指出,当前学界对于国际势力和国内要素如何影响发达民主国家税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丰厚,但对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所知甚少。<sup>④</sup> Genschel & Seelkopf (2016) 指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税收政策会在一些重大方面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如高增值税和低贸易税。但是随着经济体量逐渐接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建立起渐进式个人所得税体系。<sup>⑤</sup> 类似地, Genschel et al. (2016) 指出了政体因素对于公司税率的影响。通过分析1999-2011年间99国的数据,作者指出国家大小影响民主国家的公司税率,而独裁者国家的大小对于公司税率无影响。其原因

① Bermeo, S. (2016). Aid Is Not Oil: Donor Utility, Heterogeneous Aid, and the Aid-Democratization Relationship.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1), 1-32.

② Dietrich, S. (2016). Donor Political Economies and the Pursuit of Aid Effectiven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 (1), 65-102.

③ Anderl, F. (2016). The myth of the local.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1 (2): 197-218.

④ Swank, D. (2016).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taxatio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2): 185-207.

⑤ Genschel, P. & Seelkopf, L. (2016). Did they learn to tax? Taxation trends outside the OEC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2): 316-44.

在于独裁者国家因结构性因素不愿且无法对其公司税系统进行较大改动。<sup>①</sup>

Seelkopf et al. (2016) 对政府如何应对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贸易税收下降难题进行了解释。作者的研究指出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 以往的贸易税被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替代, 但其他的税种, 如营业税和公司所得税则多受其他因素影响。<sup>②</sup> Bastiaens & Rudra (2016) 指出政体因素对于国际制度援助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以一国的贸易税制改革为例, 作者通过国际财政组织 (如 IMF 和 WB) 对低民主国家和威权主义国家发展援助的比较, 指出国际财政组织对于前者的制度援助效果往往不如后者。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在于低民主国家的民主领袖往往对中产以上阶层的低税率诉求持怀疑态度, 因而不自觉地对国际制度援助为其打造的税收改革方案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反, 威权国家往往因不太需要考虑这一因素而乐意接受国际机构为其打造的制度改革。<sup>③</sup> 李泉 (Li 2016) 通过分析 50 多个发展中国家在 21 世纪早期的数据, 指出财政分权对于税收激励和收入汲取能力的影响取决于具体的央地关系。这一结论也挑战了财政分权总是有益和横向竞争总是产生无效的低税率这两个论断。<sup>④</sup>

针对离岸避税问题, Hakelberg (2016) 指出了大国威慑是全球合作消除离岸避税天堂的前提条件。通过分析 1996 - 2014 年间经合组织国家层面的税制协商, 作者认为当满足一国阻止将税负转嫁给劳动者和消费者, 以及再分配能够惠及更多大国或者跨国公司这两个条件时, 大国政府很可能会通过惩罚威胁手段来制裁避税天堂。<sup>⑤</sup>

## 七、小结

综上所述, 本年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制度与组织、国际贸易与投资、国际货币与金融、能源与气候变化、国际发展等具体的议题。从整体上, 2016 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 受到反全球化思潮和大国实力变化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 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宏观层面考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并提出中国在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中所应采取的应对举措。

第二, 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代表的研究范式挑战了以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和理性主义方法论。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实践经验, 文献发展了既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第三, 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 国内政治特别是政体因素和国内行为体偏好成为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及其治理规则的重要解释变量, 政治和经济跨越国内和国际层面的互动激

① Genschel, P., Lierse, H. & Seelkopf, L. (2016). Dictators don't compete: autocracy, democracy & tax competi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2): 290 - 315.

② Seelkopf, L., Lierse, H. & Schmitt, C. (2016).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modern tax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2): 208 - 31.

③ Bastiaens, I. & Rudra, N. (2016).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revenue mobilization: c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ke a differe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2): 261 - 89.

④ Li, Q. (2016).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ax incentiv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2): 232 - 60.

⑤ Hakelberg, L. (2016). Coercion in international tax cooperation: identifying the prerequisites for sanction threats by a great pow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3 (3): 511 - 41.





发了相关研究成果的产生。

第四，在新兴国家呼吁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治理改革的相关研究成为国际货币与金融方面的亮点。

第五，在国际发展领域，国内政治对援助国的援助偏好、受援国对援助的回应以及国际发展规范的本土化，成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亮点。其中，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第六，通过将全球化变量纳入对发展中国家税收政策研究，开拓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议题。这些文献集中探索了国际势力和国内要素如何共同影响发展中国家税制改革进程。

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正在呈现方法多元主义的特色。现有文献在吸纳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使用新的经济学方法和模型来验证理论假设。

从使用的数据上看，数据来源不仅包含了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公布的官方数据以及课题调研一手资料和数据，还包含对国际组织和国家行为体等的实地观察与分析。这些多元的数据来源保持了样本的丰富性、代表性与真实性。

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本年度的部分研究在议题领域和研究方法上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正如李巍和刘玮（2016）所言，无论是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上，目前阶段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正在出现超越古典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开放经济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可抓住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变革机遇，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实践出发，探索带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学派。<sup>①</sup>

<sup>①</sup> 李巍、刘玮（2016）：“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波？”，《国际政治研究》，第1期，第97-124、7页。